



# 足球传控战术的美学机理

路云亭

**摘要:** 传控打法有很强的观赏性, 其与人类以及其他猎食类生物的狩猎镜像有紧密的关联度。足球的美学法则带有很强的动物狩猎学的元素, 其中的试错与容错现象代表着一种不确定性。传控打法有模糊性的审美特质, 更有计算性的精确特色, 其所展现是一种人类与万物互动的史前性动能。团队合作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传控打法可以制造出一些无以停歇的永动机效应。传控打法有艺术流与力量流之别, 前者强调传切的精确性, 后者强调传切的速度感。传控打法有很高的美学品位, 它不仅戏仿了人类的真实狩猎镜像, 同时也是对群体狩猎型动物狩猎镜像的经典复制。持球队员与无球队员的换位能力决定了传控打法的水准, 两者的合力足以构建出一种奇幻的活体图案, 传控打法的至高价值即体现于此。传控打法还可以为球队提供持续不断的联动力, 且更易制造奇幻效果, 并催生一种诗情画意。

**关键词:** 足球竞技; 传控战法; 群猎行为; 合作美学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23)04-0008-09

DOI: 10.12064/ssr.2023041101

## The Aesthetic Rationale of Football Pass and Control Tactics

LU Yunt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pass and control gamepla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unting images of humans and other predators, has a strong aesthetic appeal. The aesthetic principle of football entails much element of animal hunting, in which trial and error and fault tolerance represent an uncertainty. The pass and control game ha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ambiguity and computing accuracy, showcasing a prehistoric kinetic energy of human interaction with all things around. Teamwork can bring more sense of security to people, and the pass and control play can create some non-stop perpetual motion effect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art and power in the pass and control play. The art emphasizes the accuracy of passing and cutting, while the power emphasizes the speed of passing and cutting. The pass and control game has a good aesthetic taste, which not only imitates the real hunting image of human beings, but also reflects the hunting image of group hunting animals. The transposition ability of the players with the ball and the players without the ball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the pass and control tactics. The combined force of the two players is enough to create a fantastic live scene which symbolizes the highest value of the pass and control game. The pass and control play can also constantly provide the team with joint force of movement, which makes it easier to create a fantastic effect as well as a picturesque scenario.

**Keywords:** football competition; pass and control tactics; group hunting behavior; cooperative aesthetics

足球有其自带的文化属性。足球并非抽象的概念组合, 恰恰相反, 足球是一种高度感性化的社会存在, 同时也是一种只需要付出简单思维即可参与的游戏活动。足球未必简单, 但仍有极为明晰的技术与战术的体系分隔线。其中有貌似大而无当的风格、体系、流派之差异, 还有看似无以穷尽的微观性细节演

示镜像。足球仅仅是一种相对原始而自然的游戏形态, 人们看到的人与球的组合态势大多源于一种最为基础性的传控配合, 因此, 传控打法既是一种战法, 亦为一种技术, 更是球员们用来谋生的一种身体定向发展的实验行为。对很多习惯于观看传控技艺的人来说, 类似的打法足以构建出足球的基本范式。

收稿日期: 2023-04-11

作者简介: 路云亭,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体育传播。E-mail: luyunting666@sina.com。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438。



传控打法宛如一种留存于世的史前狩猎的基因库,人们在此世界里可以看到带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史前狩猎图形。足球与狩猎的对应关系在传控战术中体现得更为明晰。

## 1 为获胜而营造的无限度的人员组合机制

足球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极限性、辩证性与二元性的社会存在。传控打法貌似简单,实则不易,这也可以很好地回应极简者极不易的说法。传控打法要求所有的球员几乎在同一时间持续不断地输出动力,其行为本身就带有奇幻色彩。如果说超人式的带球突破激射破门的镜像是一种单向度的人的非常态表演的话,那么,高效的传切配合则是一种人与人建立全新链接关系的场域性实验。正如任何一种实验都有成功和失败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样,足球场域中的传切配合也从来不会完全成功。试错的证伪性与接受错误的真实性构建出传切配合场面之上的另类原则,它说明了人类自然生活中的真实性。

### 1.1 传控打法的势能美感

安德森和沙利也在试探性地解读足球的群体配合美学。“这听上去挺简单的。但当我们用生物力学的方法去严谨定义‘某个人完全拥有足球’时,问题就有点复杂了。赫尔贝格观察到‘足球是圆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人类的脚,生来就没有被设计成能够控制某样东西的形状,更别提那个又大又重的球体了。”<sup>[1]136</sup> 足球的观赏性极强,成熟的传控打法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其所营造出来的镜像令人神往,但是,传控打法是一种高难度的技术组合形态,其中的至难之点是人球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人与球之间的快速而精确的接应关系。安德森和沙利还利用数字概念解读过球场上人球关系的内涵。“当球员真正持球时,每回触球次数只在两次左右,而每次控球的平均时间只有可怜的 1.1 秒。虽然这个数字可能会因为球员的位置不同而发生一些改变,但不可否认的是,球员在场上和足球接触的机会寥寥无几:99%的比赛时间里碰不到球,98.5%的跑动是空跑。即使有机会拿到球,也一闪即逝。”<sup>[1]139-140</sup> 安德森和沙利强调了速度的重要性。其实,足球尽管是一项追求速度的运动,但是,触球的过程带有人与现实游离的虚幻感,触球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行为体验,具有触摸类动作所激发出来的自我满足感。从自然进化的角度看,其具有不折不扣的珍稀性;从审美的角度看,触球的美感足以成为传控打法的心理支点。安德森和沙利很好地分析了触球技术的关键点,其中包

括触球技术与体能的非对称性现象。“‘踢球’是短时间的个人持球,加上高频率但短暂的触球,还有传球,那么球员能够‘踢’的时间还是比较可观的。这意味着比起拿到球,懂得如何控好球、设计接下来的一系列传球更为重要。”<sup>[1]140</sup> 传控打法就是这样,它需要 11 个人的大脑保持高度的同步思维的状态,正因如此,传控打法的智能性极高。这便涉及球员的专项意识与技术支撑力的配合度问题。

早期的足球技战术带有直率、粗糙的特点,仅从外在构成上说,早期足球更近似田径运动,人的奔跑力、冲撞力、抢夺力占优者往往可以获胜,其所呈现的是一种散乱、粗糙、简陋风格,其所鼓励的也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冒险主义的做派,整体的赛况缺乏内在联动感、紧密度与智能性。早期足球并无传控打法,1863 年协会足球独立后的数十年,传控打法也极不成熟。由此可知,传控打法一直以一种渐进的方法呈现出来,相对成形于 20 世纪 60 年代,而完全成熟于 21 世纪的前十年,其以巴萨足球为代表。传控打法要求有精密的技术为依托,同时还要有利他主义、团队精神以及合作至上的思想,而当初的参赛者一度缺乏类似的技术能力。

顶级的传控打法需要很强的技术支撑力。足球领域中的技术流是 20 世纪初才出现的新现象。克里斯蒂安·艾希勒并不回避技术对足球竞技的支撑作用。“技术属于人们用不着谈论的东西。”<sup>[2]147</sup> 人类对原始奔跑的行为充满了好感,因为奔跑既可避害,亦可狩猎,具有极强的实用性,但是,人类社会中原始性的奔跑行为只能创造一种气势、动态、洪流般的涌动感以及万马奔腾的壮美镜像,其美学归宿在于崇高,而在技术流掌控的足球场域中,人们更容易感受到足球的奇幻性美感。中国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曾经说起他的足球观感。“他们盘带过人,突然起脚,凌空劲叩,转身怒射,斜跃甩顶……相互之间的默契和巧妙的配合也是那样迷人,长传短递,换位交叉;阵式的变化莫测,突如其来,突如其来;全队如一体,忽而退守,忽而一致向前奔,洪水般地进攻……”<sup>[3]</sup> 这里描述出足球游戏中奇异的审美特质。人所共知的足球奇观中的绝大部分元素来自技术流领域。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那里既有一种群体狂欢的镜像,亦有一种族裔内部模仿狩猎镜像的内涵,展现出一种人与万物互动的原始性动能。

仍以狩猎为参照系。Erik Cohen 深度赞同 Franklin 的观点,高度推崇狩猎过程中的自然性的超高价值<sup>[4]</sup>。Franklin 在他研究猎人的文章中表示,狩猎的主要快乐是那种“与自然秩序暂时结合的乐趣”。



他在文章中强调:“杀戮并不能带来快乐,狩猎的快乐或兴奋源于感官上变成特定的、高度敏感的、艰难的与狩猎对象紧张的平衡性关系方面。”<sup>[4]</sup>Franklin总结道:“通过他们的书面反思,猎人……似乎表明,我们与动物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走出人类中心论的方法,一种少靠我们的智力来生活而更多地靠我们的感官来生活的机会……”<sup>[4]</sup>不可否认,足球中有胜负关系,而只要有胜负关系,就必有死亡寓意。然而,足球并非一种以演绎死亡为主题的运动,恰相反,足球将死亡寓意作了高度抽象化的处置。即便竞争最为激烈的足球竞技场面,亦无法让人感受到恐怖之类的原始性的毁灭镜像。当然,足球中还有另外一种死亡寓意。“还不要忘记奥地利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辛德勒,1938年,他拒绝为新组建的德奥联队比赛而退役,盖世太保建立了他的一个秘密档案。后来,他离奇死亡,15 000 维也纳人参加了他的葬礼。”<sup>[5]</sup>类似的突发式悲情事件已经完全超越了竞技体育的意义范畴,更非一种足球的常态。

## 1.2 仿猎群体营造的动态图景

足球是一种高度审美化的游戏形态,其直接的文化对接点仍是群体性的狩猎镜像。通常而言,外形越优美的生物,其内在的功率也越强大,类似的道理在工艺美术界也适用。外观设计好看的飞机、坦克、汽车、轮船,其内在的性能也会很好。其实,这便再度验证了世间诸般物象皆有艺术性与实用性相统一的特质,其反映的恰是大自然本身的特性。从生物本体进化的角度看,自然界中任何一种生物都谈不上丑陋,原因就在于它们与其所处环境极为吻合,且都能体现出与环境适应的本然性能力以及匹配性形貌。蟾蜍、乌龟、刺猬都属于行动缓慢的动物,如果没有特殊的防卫手段就很容易丢掉性命,于是,它们分别进化出了黏滑的毒液、坚硬的外壳以及锋利而茂密的尖刺。这些生物的外形或许不符合人类的审美习惯,却有其非凡的独一性意义。从本质上说,上述的生物皆为防御类动物,而人类是猎食类生物,因此,对同样为猎食类生物的虎、豹、鹰、狮、野犬就有审美的同感力,此类动物中不乏群体狩猎类型,人类对其更会有行为学意义上的同理心。由于人类与野生类动物生活在不同的地理区块,彼此之间有较为清晰的边界感,类似的边界感便造就出一种距离美,人类自然而然地会对猎食类动物的狩猎行为表示高度认同,并认为它们的行为缔造出一种极为惊艳的自然美学内涵。人们并非孤独的防御类生物,亦非孤独的狩猎类动物,而是群猎性动物,因此,人类对群体合

作的行为更有认同感。

足球亦然。由于团队合作的关系,传控打法在很多时候都可以给人带来更多的安全元素,它布局宏伟,联翩而动,时常在不经意间制造出一种射门得分的场面,那种镜像中不乏一种源于大自然的威力。“这两个特点看上去有些类似,但实质上迥然不同。理论上来说,得到更多控球的机会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比如,一支球队最希望的是开球时拿到一次控球权,之后一直在本方控制下,直到最后一秒进一球。这显然是理想化的。所以说得现实一点,如果想要有效地控球,我们需要减少失误,避免对方拿到球权,同时尽可能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sup>[11]</sup><sup>140</sup> 传切镜像本身就具有一种仿生物、仿自然、仿天象的流动之美,即便人们看不到其内在的数学性强度,亦可在感性化的轨道内感受到其强大的生命能量,它宛如行云映天,飞草迎风,落花逐水,完全是自然风景的具象再现形态。

## 1.3 群猎行为中的游动之美

足球的主体是人,这便意味着足球中存在大量的失误,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足球是对人类行为的全真模拟形态,当然也包括模拟人的错误性与正确性行为,两者高度的对立性催生生出一种失误感,足球的审美动态程序便具备了多元化的意味。足球中有失误率较低的人,此类人物就是人们所认知的个体英雄。然而,足球的场域中从来不存在零失误的人,人所共知的盘带大师并非零失误的演绎者,而是偶尔突破成功且能破门得分的幸运者,正因如此,足球的核心镜像一直由传控打法所构建。换句话说,高成功率的传球才是足球的主体,传控打法以其为足球场域中的基础图式,才派生出唯传球为王道的说法。“球场上超过八成的事件可以归类为传球。”<sup>[11]</sup><sup>142</sup> 如果说射门追求的是绝对的精准度的话,传球则追求的是不失误,它属于一种相对的精准度。“一言以蔽之,‘控球’就是将球传给队友。换句话说,‘控球’等于不失误的传球。”<sup>[11]</sup><sup>142-143</sup> 足球由多元化的理念组合而成,并非极端性地追求团队配合的竞技品类。现代足球尽管越来越重视身体优势,但也为身体尚无绝对优势的普通人保留了很大的演示性空间,这里依然显示出人类正在全速朝着哺乳类猎食动物演进的势能,类似的进化道路意味着人类完全脱离鱼类、鸟类生物的演进方向,进而开辟出一种独立性物种演进路径。

足球已是展示人类进化趋势的风向标。不仅如此,足球一直受到群体性精神的内质制约,足球并



不限定个人主义精神的发挥。在此意义上看,足球竞技更近似狮群狩猎。狮群狩猎有群猎型,以追求位置感的合理性为主,狮子狩猎也不妨碍个人英雄主义者发挥,与此同时,狮群狩猎以速度为终极武器,类似的能量进化方向与足球中追求最高速度的要求一致。如此这般,狮群狩猎便具备了与足球竞技的高度相似性。置身如此场域,雄狮、雌狮皆可以凭借速度与敏捷性单独狩猎,亦可合作狩猎,各自完成自己的工作。狮群狩猎中的个体差异在狩猎的过程中几乎消逝。尽管雌狮的身形不如雄狮高大威猛,但行动更为敏捷,奔袭的时间也更长,可以高效地击杀猎物。类似的情况在足球的场域中亦为常态。足球所输出的是一种效率文化,其所追求的是美与实用的结合体,正因如此,足球中有射门得分者,也有大量担任穿插、掩护、输送工作的工兵型的实干家。

从球类项目的整体视野看,传控打法并非足球的专利,相反,很多团体合作式球类项目都讲究传控。但是,足球有所不同。足球在生发之初就有类似的专属权利,足球中的角色分工更为明晰,足球中的位置感也更为强固,足球以脚为器的规则也更为奇特。埃克布洛姆曾经讲述过早期足球的传球技术。“在一个队内,队员也有明确的分工,卡鲁应用当代军事上的分类将其分为一名‘前锋卫兵’,一名‘卫兵’及两名‘边锋’。这些词语的应用如‘前锋’‘边锋’,表明了专门的比赛位置(今天的英式橄榄球和足球中也有这样的位置)在很早以前就有了。”<sup>[6]</sup>康沃尔人是早期凯尔特人的后裔,是一个富有探索精神的族群,康沃尔人不仅有抗争意识,还有很强的科学主义精神。其实,球员分工的多样性意味着球员的类型化程度很高,也更为契合物种多样性的进化原则。球员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球员如果有体重大、力量足、冲击力强的优势,便会有启动慢、转身慢、变向慢的短板。反之亦然,体重小者冲击力差,但有快速启动、穿插、急停急启的天然优势。由此可知,足球竞技不仅与狮群狩猎高度相似,还与物种进化的自然态势完全吻合。

英国的吉米·伯恩斯<sup>[7]</sup>认为,技术高超的小个子球员在场上往往比身材高大但技术粗糙的球员更引人注目。克里斯蒂安·艾希勒解读了德国足球所崇尚的整体主义的合理性。“可能有那么一些年,粗壮如牛的奔跑健将和踢人能手给德国国家队的形象打上了烙印——但是,假如只会奔跑和搏击的话,他们就不会三次成为世界冠军。自从南美人的影响在20年代延伸到美冠里以来,自从沙尔克队的陀螺式足球问世以来,技术一流的德国协会球队和技术出

众的国家队球员不断地涌现。德国足球从未成为过技术救助机构的服务对象。”<sup>[2][49]</sup>显而易见,足球对球员、技术、风格、流派的容纳空间很大,几乎可以容纳所有人的自然性运动取向。

## 2 传控打法可以制造出一些无以休歇的生物本体效应

作为一种戏仿群猎手段的行为,传控打法中有很好的均衡主义原则,它给一些弱小的球员带来了机会,一些不具备卓越性技术的球员也会在团队配合的前提下展示出自己的战斗力,进而制造出一种励志故事,足球由此而变成了一种值得追忆的物象。不难看出,贝利、马拉多纳、梅西并不以身体彪悍名世,但他们在足球的场域中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足球高度的辩证主义精神蕴含着维护自然进化体系完整性的深刻命意。

### 2.1 以鸟为范的行为机理

传控打法只是一种理念、工具、方略,当然也是一种极为普遍性的存在,其本身毫无特殊之处,传控打法与优秀球队的关系就好像乐器与演奏家的关系。工具使用得当方可焕发出耀眼光芒。但是,高端球队会将其当作一种信仰条则,并将其改造为一种体现团队合作能力最高境界的符号体系。联动力超强的球队亦与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强大的企业很相似。“‘一个大的企业非常慢,主要是它有很多阶层,沟通非常不顺畅甚至僵硬;但只要创建一个高度联系、高度非中心化的组织,情况将不同。’他说,棕鸟组织自动具有有序运动的能力,即自动变革创新的能力。而棕鸟式组织的关键是‘去中心化’,但对‘去中心化’本身毫无用处,只有 highly-connected(高度连接),highly-decentralized(高度灵活)的组织,才能最终达到 highly-adaptive(高效),即高度联结同时去中心化才有意义。”<sup>[8]</sup>不得不说,人类很难完全朝着棕鸟的行为方式进化,这也意味着足球很难成为一种单一打法的载体。由此可知,传控足球也有去中心化的势能,其基本能量中蕴含着一种排斥个人超逸性表现的元素。相对而言,盘带技术本身更贴近个体体验的类型,它属于一种个体选择行为。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盘带技术是一种极难完全掌握的技术类型,然而,足球场域中充满了极限对应关系,如果球员的盘带能力有限,尚可用力量、体能来弥补,通常来说,强悍的奔跑力可以适当地弥补技术能力不足的短板,反之亦然,类似现象的极端形态便是传控打法。在此意义上看,传控打法恰是球员能力不够强大



前提下的一种妥协状态。且以德国人的足球理念为例,克里斯蒂安·艾希勒<sup>[21]49</sup>认为技术好的球员往往在身体上并不出色。由此可知,足球是一种融通性事件,其突出的特征便是偶发性、不确定性以及未知性。

## 2.2 与自然同化的审美张力

传控打法很难回避一些具体的问题。要先说到球星主义体系内的艺术派与力量派差异,梅西、内马尔属于艺术派,而姆巴佩、哈兰德则属于力量派。技战术体系中也有传控派与力量派的分野,权且以巴西足球与德国足球为范式。传控打法与力量打法体系内隐含不同的个人精英主义理念。姆巴佩在大巴黎和法国国家队都有突出的表现,凭借的是冲击力。梅西在巴萨以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上阿根廷队中也有上佳表现,而其价值更多体现在盘带层面。正因如此,很难说清楚足球中技术流与力量流孰优孰劣的问题。就时下的情况看,两种流派既有模糊呈现的可能性,也有清晰可见的流派分解图式,两者都在现代足球的历史上有过高光时刻,各执牛耳若干年。

德国足球素来依仗超强的力量,克里斯蒂安·艾希勒讲出了其中的缘由。“赫尔伯特·普罗哈斯卡(Herbert Prohaska)是奥地利人,1978年在科尔多瓦以3:2获胜的那场比赛中的场上灵魂,还曾经带给德国人一场足球危机,针对德国足球的陈规俗套,他颇有见地地说:‘奥地利人的技术之所以引人注目,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在体能上处于劣势。’”<sup>[21]49</sup>良好的体能可以保证球员具有看似永不停歇的冲击力,这样的球队大体可以战胜貌似不切实际的花哨型艺术足球,但是,极为优秀的艺术足球也可以使得所有的力量足球队陷入无用武之地,足球诱惑力正体现在这种刚柔相济的对立统一关系网系之中。

应当承认,世界足球一直在力量型与艺术型之间摇摆,而摇摆最为明显者为艺术足球,且以巴西足球为例。罗杰·凯特森<sup>[9]85</sup>记述:“1970年世界杯结束两天之后,专栏作家阿曼德·诺曼拉睿智地预测,一定会有人说这个国家的胜利只是在于足球天才,那么另一些人则会说‘战略准备’和‘体能准备’是巴西成功的真正原因。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即为人们熟知的作为艺术足球和力量足球之间的博弈,这样的争论仿佛令人吃惊。”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巴西足球就是桑巴足球的代名词,属于艺术足球的典范,其实不然。1975年,时任巴西体育联盟主席的阿维兰热要求巴西必须以胜利为宗旨,而无须过度关照所谓的传统风格。“批评家们迅速指出,政府想要国家足

球队能够步伐一致,他们实际并不信赖那些足球界曾经给巴西定义的特征:创造性、单纯的快乐和球场上的小伎俩。”<sup>[9]88</sup>由此可知,即便如巴西这样的艺术足球发源地,其国内也存在一种极度追求实际效能的足球理念。

在传控打法的视野上,艺术足球与力量足球各有千秋。前者强调传切的复杂性,后者强调传切的速度感。两者都曾在足球历史上创造过极为显赫的成绩。不言而喻,传控打法一度在很多球队都存在,但是,其终极形态在21世纪初期的西班牙球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西班牙队获得2010年南非世界杯冠军。受到巴萨球风的影响,这支西班牙队追求的恰是绝对纯正的传控打法。时任西班牙队中场的哈维认为:“西班牙足球在发展,以前在比赛中,我们更倾向于激怒对手,争取在心理战中处上风。现在我们已经改变了那种策略,我们要争取控球,成为场上的主角。”<sup>[10]</sup>当一种足球风格步入成熟的地步之后,所有的结果都会生发出积极的能量。西班牙的约翰·卡林曾以斗牛为比照对象,借以说明足球的特殊品质。“这与斗牛如出一辙,斗牛最终目的并不是杀死牛,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将牛杀死的仪态。此外还有勇气、艺术性和华丽。伯纳乌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中,人们头脑中想到的就是‘斗牛比赛’中的形象。”<sup>[11]17</sup>约翰·卡林对皇马的传控技术极为欣赏,并以曼联为陪衬,对银河战舰时代的皇马球员作出了高度评价。“两队在技术层次上的差距几乎让人尴尬,就像一支酒吧乐队和一支交响乐团。皇马所演奏的‘音乐’如此美妙,因为炉火纯青的技艺让每一位成员对自己手中的乐器都能驾轻就熟。从来没有这样一支球队,如此众多的球星能够像齐达内和葡萄牙巨星费戈那样,不管是在静止状态还是在跑动中,都能完成如此完美的触球,以及收放自如的接球传球。”<sup>[11]17-18</sup>银河战舰时代的皇马轻松自如的传接球技术很容易成为人们迷恋的对象。当对手的传控水准明显不及皇马之时,人们就会看到失去比赛平衡后的另一番景象。“皇马球员们根本不用将自己大师般的控球技术发挥到极致,因为队友们所传出的球,无论从力度、节奏还是角度来说,都一直很棒。”<sup>[11]18</sup>2013年2月20日,哈维对媒体公然声明,他更喜欢瓜迪奥拉、比拉诺瓦以及鲁拉的执教方式,哈维认为那是克鲁伊夫为巴萨队设计好的机制。哈维表示,不应该以另外的方式来理解、解读、诠释足球。在此意义上或可认为,艺术足球的典型标志与其说是盘带射门,不如说是高密度、多向度、精确性的复合式传球范式。



## 2.3 作为传控顶流的艺术足球

或许因为南欧人身体的灵巧度略高于西欧与北欧人之故,西班牙球队一以贯之地选择了整体足球理念,并试图将传切配合的技战术体系发挥到极致。西班牙球队在欧冠体系内的卓越表现正体现出了这一规律。足球风格的确有多多样性,足球风格的形成其实也可以追溯到足球的原点。“爱好桑巴舞的巴西人踢出的是桑巴式足球;做事严谨、笃实的德国人踢出的是进行曲式的足球;喜欢种植郁金香,曾是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踢出的是全攻全守的足球等等。现代足球鼻祖英国的英式足球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的具体表现。”<sup>[12]</sup>足球的整合力很强,且以巴萨为例。梅西出走大巴黎后的一段时间,巴萨陷入短暂的混乱时期,但在哈维回归后,巴萨开始走向正规,但是,巴萨逐渐朝着血性化、力量化、拼搏化的方向发展,从纯技术流走向力量流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由此可知,足球有很大的游走力。足球尽管有很多种类的技战术,但是,人们还是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力量派与艺术派的差异。不仅如此,在力量型或艺术型的队伍中,依旧可以细化出诸多的风格类型。很多人习惯于将巴萨足球和巴西足球作比,认为两者都属于艺术足球,其实两者仍旧有着本质的差异。巴西足球的生物感更强,巴萨足球的数学感更突出。巴西足球的本体捍卫的仍是一种球感至上主义思想,而巴萨足球的根本仍在于一种数字化的传切模式。换句话说,巴西足球的人性化的成分更浓厚,尽管力量足球也赢得很多巴西人的认可,但是,艺术足球在巴西人心目中的地位更高。罗杰·凯特森曾对此做过分析。“艺术足球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重要积极的含义。因为1970年桑巴军团的表现和风格来自贫穷的、棕色皮肤的人民大众,那么人们对贝利和他的队友们以及艺术足球的欢呼也是对平民是真正巴西人这一观点的认同。”<sup>[19]88</sup>很多人看到了巴西足球的个体主义精神,但是,巴西从来未曾放弃对整体性技战术信念的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巴西足球的主体一直是非自觉的人,而非一种经过统一意志规训的战士。罗杰·凯特森还看到了巴西足球的民族性问题。“热带风情的或者穆拉脱式的足球理念一直都包含了对穆拉脱人、麦士蒂索人和黑人的极具优越感和本质化的描述,并且艺术足球理念也一直保有这个传统。”<sup>[19]88</sup>坦白而言,巴西足球的自然性元素更丰沛,而欧洲顶级俱乐部足球的计算性更强。两者虽然都追求水银泻地般的传控打法,但欧洲顶级俱乐部的足球理念仍植根于欧洲,且从未丢弃欧洲足球高度严谨的计算机化的组合体系。

这里需要解读一下欧洲足球的科学性与巴西足球的自然性的对冲关系。瓜迪奥拉、穆里尼奥、勒夫都使用智能软件安排足球技战术,由此可见,欧洲教练虽然尊崇足球的自然性,却仍旧维持着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执教方略。安德森和沙利显然重视足球竞技中的理性主义元素。“分析学是整个体育界的尖端课题,在足球圈内也飞速发展。”<sup>[117]</sup>然而,足球的风格形态犹如生物进化的差异性。巴西足球进化出了与世不同的另类足球范式。罗杰·凯特森认为:“通过1958年和1962年的成功,1970年的桑巴军团似乎证实了巴西将像贝利和托斯塔奥一样一直表现优异。这意味着,‘用最纯粹的艺术’去战胜他们的对手。”<sup>[19]84</sup>不仅如此,很多巴西人开始迷信类似的风格,并视之作为一种克敌制胜的最佳法器。“获得了三次世界杯冠军头衔和雷米特杯,巴西似乎已经巩固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足球风格发源地的地位,这种足球风格是清新迷人的非欧洲(甚至是反欧洲)的方式,但是却能够力克欧洲强国。”<sup>[19]84</sup>由此可知,足球中最不缺乏的便是对冲性思想,足球中有科学,当然也会有执念,有清晰的思想,亦有模糊的意志,有决定成败的实力,亦有不可胜数的偶发性元素。足球中从来不乏有信仰,而信仰的背面则是迷信。

## 3 传控游戏的日常审美维度

尚可发现,足球中的风格、体系、价值观、理念从未固定,人们可以超越任何一种范式,缔造全新的模块,但足球的基本技战术体系却无法超越,那里展示的是足球的基本形态。足球中所有的元素充满了开放性,而对抗则是其中最不可颠覆的绝对品格。正因如此,足球的传控打法已经积淀为足球的基本局。

### 3.1 传控打法的布局审美

埃克布洛姆进而讨论了球类项目的分流现象。“卡鲁还提到了骑马队员和跑步队员的分类,这很有意思,说明在这种民间比赛中,一些比赛的组成部分后来变成了独立的比赛——例如投掷铅球比赛、马球比赛——而这些组成部分在当时被引进一项单独比赛的整体之中。”<sup>[16]6</sup>从实战的角度看,传控打法的可控性更强,章法可循,它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有审美方面的优势,传控打法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作为一种技战术系统,其市场占有额也很大。约翰·卡林<sup>[11]16</sup>在描述皇马与曼联的欧冠赛事时将大量的赞美性语汇送给了传控更好的皇马一方。高强度的传控的确更富有游戏性,而足球的游戏性元素也会在此情境中得以强化。“齐达内控球——他的动



作就像在说,别着急,我们拿球,我们控制主动权——直到一位曼联后卫断球。”<sup>[11]16</sup> 在人的联动性本能的支配下,传控打法自身的艺术旨趣也会时而得以激发,它时不时地散发出一种乱花飞蝶的自然乐趣,而陶醉于如此镜像中的人很难跳出其既有的美感藩篱。

足球的简约化程度极高,它删除了很多非史前性的元素,将人类还原到一种原始群猎者的地位。Erik Cohen 曾经阐释过现代狩猎业积极的社会功能。“根据流行的休闲狩猎意识形态,狩猎必须发生在野外,按照传统观念,须在一个被认为是野生的地区,正因如此,那里的动物将不受限制,这是‘公平追逐’的先决条件。”<sup>[14]</sup>从自然至上的维度考量,足球中的传控技术与狩猎技术的相似度很高,两者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参与其中的都会获得一种人人平等的感受。换句话说,传控体系其实在每一个球员心中种植了一颗平均主义的火种,它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找到了皈依感,而要实现这种人人有归宿的愿望,就必须给每个人带来近乎平等的机会。

从现阶段足球发展的态势来看,大数据的分析法更容易实现目标。安德森和沙利曾经明确指出了大数据时代足球的特殊性。“切尔西队中具有超前思维的足球运营总监迈克·福德说,他的球队已经收集到了‘12 000 多场比赛中的大约 3 200 万条数据’。”<sup>[11]7</sup>无可否认,传控打法并非固化的技战术套路,那里有乱花迷眼的团队合作镜像,亦有盘带者个人的独角戏表演,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放弃平均主义的思想,亦可以扮演单枪匹马、独闯虎穴的孤胆英雄。传控打法的镜像感很强,至少在群起群落的意象上看,传控打法的人流量很大,时常展示出一种冲决而起、潮涌潮动的镜像,而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都试图超越自己,成为传控打法过程中的临时主宰者。传控打法需要群体的合作,同时也需要个体性的表演。简单来说,传控打法呈现出一种个体的表演性与整体的计算性相对对立的状态,它也构建出现代足球的整体发展方向,而置身其中者则几乎无时无刻不面临一种多元互动感的张力考验。

### 3.2 传控美学对功利主义的超越

传控打法就是这样,它在最需要展示绝对胜负率的场域轻松地拿捏着平均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天平支点,由此可知,传控打法所支撑的恰是一种高度的平民主义原则和理想。罗杰·凯特森曾经解读过巴西足球的平民性。“一般情况下,球迷会本能地认同传奇化的普通人是‘人民的队伍’中的精华,而‘人民的

队伍’通常被用来描述 1970 年的桑巴军团。”<sup>[9]88</sup>不难看出,追求绝对配合度的技战术体系也意味着球员可以获得最具个性化的发挥,球员间的精妙配合现象也就此得以呈现。Steffen Borge 在阐释足球的竞赛美学时辨析了康德的两种美学旨趣。“康德有时将审美态度的有效性之美称为自由的美,然后他将其与可以信赖的美进行对比。自由的美是美,它是一种为冷静的沉思而进行的无私的审美凝视。……依赖性的美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展示其特定功能的现象。自由的美是独立于功能之外,而依赖性的美则不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像康德的所有作品一样——如何理解他对自由的美和依赖性的美的区分,以及对依赖美的感知和关注是否符合审美体验。”<sup>[13]</sup>这里折射的是一种富含现代主义精神的自由的美。

从宏观的角度看,足球富含一种自然、自在、自由之美。莫里斯<sup>[14]</sup>曾将足球喻为一种部落文化,将足球的圈子喻为足球部落,这是一种很精确的隐喻,其意义所指十分明确,它有效地固化了足球的远古性、原始性与人类在未实现工业化之前的自然心性。置身于这样的足球部落场域,人们仿佛进入虚拟之境,尚可随心所欲地膜拜那种部落领袖,却也会在部落领袖盘带失败的时候背离这种战术体系,将更为宏大的理想寄托到参与传控行为中的每一个狩猎者的身上。可以确认,远古时代的狩猎之风早已在现时代的文化潮流中消失殆尽,唯有足球的领域完整地保留人类的狩猎基因,这便是足球风行世界的主体缘由。与此同时,足球中还有一种利他主义乃至自我牺牲的道德法则。传控打法中的利他主义元素要更为高级一些,其以自愿为基石,又以自由精神为依托,进而构建出一种能动性很强的利他主义的道德化美学体系,它也间接地构建出助攻类评价数据体系。

足球拥有专属于自己的价值范式。足球中的利他主义元素带有原始性特性,利他主义者可以帮助球队获胜,却无以统领天下,足球还是冒险者的家园。足球高度容纳人类所有的极限性行为元素,那里呈现出一种貌似矛盾的镜像。在集团主义意念的制约下,足球到处都在鼓励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人们在传控打法的体系更容易发现类似的元素。传控打法不追求或制造过于惊艳的得分瞬间,却一直以效率为上,具有足球运动常态化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然而,当利他主义精神受阻之时,冒险主义就会浮现出来,成为足球的另类样貌。足球便在这种看似对冲的语境中营造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气息。不言而喻,追忆足球可以产生诗、电影、画面,更可催生一种诗意化



的文字,它将足球的谦卑性与冒险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理性与非理性组合在一起,借以构建出一种更为宏富的史前文化体系。

### 3.3 群体狩猎的极限寓意

狩猎同样是利他主义与冒险主义相融合的产物。足球的传控打法与人类早年的狩猎技艺关系密切,类似现象一直延伸到距今不远的年代。与真实的足球赛事一样,历史上真实狩猎的画面感很强。一些描述狩猎现场的图书曾经这样讲述合作式狩猎的场景。“还有的巡猎由二人或二人以上组成,协同动作,一旦发现鸭、雁群,一人潜行爬摸,接近到一定的距离,选好地点,埋伏河岸、沟坎之下,另一人则从相反的方向轰赶野禽,当鸭(雁)群低空飞来时,埋伏的猎手举枪射击,常能迎枪而落。这是巡猎与伏猎的变换。”<sup>[15]</sup>类似的行为或许会遭到当下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反对,但也确实反映了实用性狩猎的真实场景。苏联作家阿基莫娃就高度肯定过狄德罗反对狩猎的意识。“人们解释说,狩猎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为了保护自己不受猛兽的危害,以及为自己寻觅食物的切身需要。人是一切动物中最勇敢的动物。”<sup>[16]</sup>历史是人性的再陈述形态,因为历史总会被人记起,用于消弭现实中真实的风险。于是,人们最终在各种球类游戏中找到了一种风险与平和、现实与历史、绝对范式与相对形态的平衡器,而足球就此成为人类早期狩猎在现代社会的精神替代品。

足球从未辜负信奉者,也一直是一种具象而微观性的存在物。较诸盘带射门,传控打法更有持久性、稳定性与可靠性。历史不会有催眠效果,但是,历史营造出来的幻象则具备了催眠效能。足球就是一种致幻性文化实体。在很多时候都是如此,顶级水平的传控打法极具催眠感,其所释放出来的是一种让任何一个球迷安全进入深度迷醉状态的能量,身处此境的球迷宛如婴儿,当他们看到梦幻般的传切配合之后,便会萌生熟睡的感觉。“我认为:足球是属于感性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性的。”<sup>[17]</sup>其实,足球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必然性这一概念。从足球既往的镜像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足球几乎为偶然性所主宰,足球中最为丰满的意义并不在于必然为之,而在于可以为之。大卫·克里斯蒂安曾经讲述过人类进化乃至最终存活下来的偶然性环节。“也许进化只允许其中的一个物种跨越集体知识的节点。一种进化机制被称作竞争排斥原理(competitive exclusion principle,或译竞争排除原则),说明两个物种为何不能同时共享同一个生态位,结果只能是一个物种淘汰另一个物

种,因为前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这一生态位,哪怕只是稍微强那么一点点。”<sup>[18]</sup>人类进化如此,人类创造的顶级的文化类型亦如此。

## 4 结束语

足球始终都游走在人类的个体意志与群体联动的形态之间,借以仿制人性的真实性,这便注定了足球很难值得人们倚重。换句话说,足球无法让人信赖,因为它始终生存于不确定性的世界。真实的情况也是如此,足球以其联动性太强,便只能昭示一种无以言说的偶然性镜像。足球的各种技战术理念也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呈现。简单来说,足球中的传控打法释放的也是一种偶然性情结,不同之处在于它将足球竞技中的偶然现象假设为一种必然性。足球的真实性与虚拟的辩证关系在此得以显示,又弥漫在赛场中的任何角落,且在一种不经意间展示出一种人类狩猎学价值的固有内涵。传控打法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内涵,但它依旧属于纯正的狩猎性冒险行为,在此意义上看,足球与其他任何一种确定性文化都大异其趣。如此这般,人们才可以很好地理解传控打法的深刻含义。足球就是这样,救星式打法与群狼式战法既相互排异,又相互补足,它们看似徘徊于极端状态,却可以自然切换,实现无缝连接。

## 参考文献:

- [1] 克里斯·安德森,戴维·沙利.数字游戏:关于足球,你全弄错了……吗?[M].彭鸣皋,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 [2] 克里斯蒂安·艾希勒.足球神话[M].王剑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3] 孙道临.走进阳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70.
- [4] ERIK C. Recreational hunting: Ethics, experiences and commoditization.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J].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2014, 39(1):10-11.
- [5] 刘伟馨.读碟[M].上海:文汇出版社,2013:88.
- [6] 比约恩·埃克布洛姆.足球[M].陈易章,等译.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 [7] 吉米·伯恩斯.上帝之手:马拉多纳的真实生活[M].刘国栋,刘宏现,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248.
- [8] 中国经营网.三星危机爆发将会是下一个诺基亚[J].中国外资,2015(3):64.
- [9] 罗杰·凯特森.足球之国:足球与现代巴西[M].田智会,杨梅,曾子轩,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
- [10] 曼努埃尔·布鲁尼亚.哈维:足球的主宰[M].袁仲实,吴迪,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5:134.



- [11] 约翰·卡林. 白天使: 贝克汉姆、皇家马德里和全新足球[M]. 颜强, 谢泽畅, 陈江源,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5.
- [12] 冯新华. 恪守下的洒脱: 英国[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 109.
- [13] STEFFEN B. An agon aesthetics of football[J]. Sport, Ethics and Philosophy, 2015, 9(2): 100.
- [14] 德斯蒙德·莫里斯. 为什么是足球? [M]. 易晨光,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13.
- [15] 王廷. 狩猎[M]. 南昌: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0.
- [16] 阿基莫娃. 狄德罗传[M]. 赵永穆, 陈行慧, 赵仲元, 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174.
- [17] 王威尔. 此间花树[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9: 171.
- [18] 大卫·克里斯蒂安. 起源: 万物大历史[M]. 孙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9: 164.
- (责任编辑: 晏慧)

(上接第7页)

- [12] 柴王军, 李杨帆, 李国, 等. 数字技术赋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困境及纾解路径[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9(3): 292-300.
- [13] 王莞.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人体运动姿态估计与识别[D].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 2020.
- [14] 贾斌, 王保金.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7(4): 430-436.
- [15] 傅钢强, 魏歆媚, 刘东锋. 人工智能赋能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的基本表征、应用价值及深化路径[J]. 体育学研究, 2021, 35(4): 20-28.
- [16] 郑芳, 徐伟康. 我国智能体育: 兴起、发展与对策研究[J]. 体育科学, 2019, 39(12): 14-24.
- [17] 王宁宁, 程文广. 新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教育评价改革动因溯源及路径指向[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1(3): 21-28.
- [18] 周龙, 陈桂岑, 吴宾, 等.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改革视域下大学与中学体育教学衔接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6(6): 658-665.
- [19] 刘文昊, 冯鑫, 胡海旭. 东京奥运会延期下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应变举措及对我国奥运备战的启示[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7(6): 641-647.
- [20] 朱传耿, 郭修金, 王凯, 等. 新时代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兼论“南体模式”创新[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1): 1-11.
- [21] 陈刚.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开创江苏体育发展新局面[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1): 1-6.
- [22] 张健, 孙辉, 李婷文, 等. 大型体育赛事及其衍生品的社会经济效益与优化策略[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7(1): 51-58.
- [23] 马运超, 纪仲秋, 孙晋海. 基于开放式创新的我国体育科研协同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6, 39(11): 18-24.
- [24] 关朝阳, 周娜娜. 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及转化路径[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9(1): 125-131.
- [25] 柴王军, 刘哲辰, 李国.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模式与推进策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6): 63-71.
- (责任编辑: 黄笑炎)